

巴人文集

· 回忆录卷 ·



宁波出版社

巴人文集

·回忆录卷·

浙江省
社会科学院

《巴人文集》编委会 编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振声

封面设计：陈 杰

巴人文集·回忆录卷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巴人文集》编委会编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市县前街 61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照排中心照排

萧山市文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6.25 印张 408 千字

印数：1—1000 册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602—162—0/I·33

定价：25 元

巴人与《风下之国散记》

谷斯范

编完了巴人(王任叔)同志遗著《印尼散记》，夜深人静，一灯相对，不禁想起他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所写遗书中的一条：

“如果允许的话，死后火化，分骨灰为二瓶，一送我出生地大堰，在我们宅后竹山上埋下，一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度尼西亚的人民！”

巴人同志生前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迫害，被抄家、隔离审查，戴上了“叛徒”、“老牌修正主义”等几顶帽子。隔离审查撤销后，不作结论，每月只给少许生活费。他的健康情况迅速恶化，经常晕倒，大小便失禁。他自知随时可能死去，写下遗书，提出八条：其一，要求对他的问题早作结论，不要再拖下去。其二，被抄走的二万多元存款(主要来自《文学论稿》的稿费和平时的工资节余)，同意上缴给国家。最后一条便是死后的骨灰处理。不久，精神失常，被遣送回奉化县原籍。担任押送的干部，向大堰公社交代巴人同志的身份，说是“尚未查清的叛徒”。下乡后第二年春天，发病时情况更严重，说话语无伦次，见了熟人也不认识。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死在奉化县医院。去世时，身边没一个熟人。第二天，他的侄儿王梦林，用货车把遗体运回六十里外的家乡大堰村。巴人同志神志清楚时，曾对梦林说过：“我死后不要用棺木安葬，可用两把干柴放溪滩上烧掉。骨灰分成两半，一半用锄头挖个小洞，葬到后面山上；另一半带到上海抛进黄浦江，希望能流到海里去。我怀念曾与我共患难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我怀念远离祖国、散居南洋的

侨胞们！”可是县境内没有火葬设备，又不忍心用两把干柴处理遗体，梦林只得违背他叔父的愿望，用棺木葬在后山上。

巴人同志跟印度尼西亚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几年里，在苏门答腊的城市和农村，一起艰苦地作斗争。为不让荷兰殖民主义者重温旧梦，不惜与印尼革命者一同身系囹圄。建国后，他又出任我国第一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他在《怀印度尼西亚》一篇文章里说：“印度尼西亚人民虽然过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奴役生活，但他们依然是自由奔放的豪迈性格的人民。他们从来没有向殖民主义者低过头，即使穷困到一无所有，土地、劳动和一瓢箪的饮食都离开了他们，但他们还是坦然若无所谓。在大树的浓影之下，在如茵的绿草地上，枵腹仰卧，唱着他们的欢乐的歌曲。这是我在印度尼西亚乡村中常常遇见的情况。……在我生活于印度尼西亚的这些年月里，我常常为那些处在极端贫困生活之中而仍不失他那自由奔放的豪迈心情的人民而十分感动。”“那些穷困而又朴实，坦率而又热情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他们可爱的形象——那围着褐色花条纱笼、裸露着精瘦的上身，有一副紫铜色骨棱棱的脸型和一对海一样深的晶黑的眼睛的形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深深地为他们的命运祝福！”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另一篇文章里说：“五十年的生命，除掉年幼无知，几乎六分之一的最应有为的时间投入在浩瀚天空的‘风下之国’里，那被挂帆东来的西欧强盗们叫做‘在风之下’的南洋群岛上。因之，有个心愿：记述这战乱中有血有泪的火焰似的生活吧，而题其名曰《风下之国散记》。”抗战胜利后，胡愈之同志从苏门答腊回到新加坡，创办周刊《风下》。集子中的《邻人们》，便是以《风下之国散记》为副题，连续发表于周刊。

烟波的《客居在印尼的王任叔》，发表于四十年代，对巴人在印尼的生活有一段记述。这资料是很可珍贵的，转录如下：

……棉兰是苏门答腊的首府，那边的华侨不但人数多，而

且文化程度比较高，一般华侨青年的民族意识也很强。王任叔虽然已是快近五十岁的人，他的革命热情却还象火一般炽烈。到了棉兰那样的环境里，他当然不愿再无声无息地蛰伏，做一个消极的难民，而想在民族抗战的大业上仍然有所贡献。他集合了一班头脑清楚的青年，在敌人的刺刀统治下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名为“苏门答腊华侨反法西斯同盟”。同盟在他的领导之下，出版了一张油印报纸，进行抗敌宣传。

同盟大概存在了一年光景，终于在一九四三年秋被敌人破获，株连者达八、九十人之多，王任叔仅以身免。敌人看出王任叔这个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对头，所以侦骑四出，要捉拿他。幸而敌人在南洋到底人生路不熟，另一方面不论华侨或当地土著民族，都对敌人恨之刺骨，对抗日分子都自愿多方掩护。所以他躲进山芭（即乡村）以后，总算始终没有给敌人发现而遭他们的毒手。

这一回，我们的王任叔先生不但住在乡下，而且硬是拿起锄头来种田、栽菜。你别看他是一位拿笔杆的文化人，拿起锄头来倒也很出色。虽然有几个青年人跟他住在一起，据说下起田来还是他走上前。那时，他砍柴挑水，什么粗工作都做，而晚上还得研读印度尼西亚文，或和青年们讨论问题。在这一时期中，他留了须，据说后来已长到了胸前，俨然成了一位美髯公。敌人投降以后，他剃了须，但满头冰霜，头发已大半花白了。残酷的岁月也终于在我们这位青年般热烈的作家身上留下了它的痕迹。

敌人投降以后，他又回到了棉兰，过去被捕的反法西斯同盟盟员也大多出了狱。于是他重整旗鼓，把“反法西斯同盟”改名为“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出版同盟机关刊物《前进》周刊，团结了大部分进步的华侨青年。此外，他又和邵宗汉先生等协助当地华侨组织“棉兰华侨总会”，作为棉兰华侨的统一领导机

关,进行有关华侨福利的种种工作,诸如复办学校,统办粮食等等,都办得有相当的成绩。因为华侨总会采取民族合作的态度,所以跟印尼人方面能够保持很友好的关系,而使棉兰的中华、印尼两民族,在那种乱哄哄的局面下得以相安无事。

当年与巴人同志一起避难到苏门答腊农村的,有胡愈之、沈兹九夫妇,郁达夫和诗人杨骚等。郁达夫化名赵廉,以商人面目出现,不幸遭奸徒告密,停战后被日寇杀害于丹戎革岱。杨骚即《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中的“老 Y”,他于一九五二年回国,想写些表现我们伟大时代的新的诗作,下乡体验生活,过分劳累,得了脑血管栓塞症,卧病数年后死去。巴人同志写了《记杨骚》一文悼念他。集子中所说到的小刘,原名雷德容,又名恂予,刘岩是她的化名,山西平遥人。抗战全面爆发时,肄业于北平中国大学,以后由平津辗转至四川,皖南事变后赴新加坡。她是巴人同志的战友和伴侣。隐居苏门答腊农村时,巴人同志患过一场伤寒病,几乎死去,靠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才没被病魔夺去生命。《在泗拉巴耶村》里有这样一段话:“小刘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好好安睡过,真的是寸步不移、衣不解带地伺候着我。小刘的身体本来极为虚弱。这一段辛苦的伺候,白天既要安排调度一切,夜里又不敢入睡任蚊子围攻,睁着眼看我病情的变化,这种下她后来黄疸病的根子。”一九四七年十月,遭荷兰殖民者驱逐,偕小刘同志回到香港,住在青山农村一间小屋里。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从苏门答腊被荷兰驱逐出来,我们的情境,真的是‘病贫交迫’。中国文句的魔力,不到亲身体验过是不会十分理解的。‘病’、‘贫’而又‘交迫’,可不叫人够受的。但我咬着牙,决不愿意表示自己是生活战线上的败卒。我一面照顾恂予的病,一面应孔另境的《今文学》的索稿,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下了《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对事件的发展,没有很好结构;对人物也没有用心的刻画。怕算不了是艺术品吧。然而,我要‘散记’的是生活,这生活是

通过我笔下人物,将自己甘苦的命运的酒注下在里面了。”他又说:“如果不因为我们贫困,我们不必去住青山那农村里,使恂予在香港市内,也有便于就医的机会。阎王簿上写定了人的寿数的事是不会有,人力毕竟可以胜天。及早给恂予的病以更好的医治,也许她还能看到今日中国人民的大胜利,这正是她苦难一生的希望。然而,她没有这幸福。”小刘同志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于香港去世。巴人同志回到祖国,一九五〇年八月出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一九五四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反右倾”时,被康生指名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一九六一年撤销职务,调到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集子中的《在泗拉巴耶村》和《从棉兰到蒂加笃罗》,是去年在发还抄家杂物中发现的原稿,写作日期不明,可能是被撤职后抽时间写的。粉碎了“四人帮”,笼罩在我们祖国头上的阴云消散,十亿人民重见天日,这两篇作品终于也有了跟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我们伟大的党,为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王任叔同志,平反了错案,恢复了名誉。

这个集子编得不够理想,但多少实现了巴人同志生前想出版一部《风下之国散记》的心愿。半瓶骨灰未能投之于海,但愿这个集子可代替把他的怀念与祝福带到海外。

附带说明一下,本集所收的文章,写的均是四十年代的事情,书中所涉及到的华侨,后来情况有不小的变化,其中有的人已经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为了尊重作者,我们这次按原文收编成集,未作大的改动。

1982年7月修改

巴人文集·回忆录卷

目 录

巴人与《风下之国散记（代序） … 谷斯范	（1）
旅广手记·····	（1）
印尼散记·····	（127）
附录·····	（467）
〔一〕 自传·····	（469）
〔二〕 忆宁波建党初期·····	（494）
〔三〕 巴人著译书目·····	（501）
编选说明·····	（509）

旅 广 手 记

目 次

第一章	出走	(5)
第二章	在幼稚园里	(11)
第三章	公平轮上	(18)
第四章	泰安栈	(26)
第五章	“走马上任”	(35)
附	特制曲尺	(42)
第六章	所谓革命工作	(45)
第七章	登户船上	(54)
第八章	一个陌生的朋友	(61)
附	怀以仁	(69)
第九章	“攒纱帽”后	(73)
第十章	董挚声来访	(86)
附	蛙 虫	(93)
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底子	(102)
第十二章	“受宠若惊”	(108)
第十三章	最后一次的报导	(113)
第十四章	回乡后	(124)

第一章 出走

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天下午。是星期日，天气晴朗而美好。我同世楣正向北门外锦屏山上的公园走去。快要走到转向北门去的一条长弄上，竹书从后面紧急地赶来，我们停下了，他赶上了几步，气喘的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那苍黄的瓢儿形的脸上，显得灰白而阴暗了。

“县政府派了警察来学校，正在找你。他们将要逮捕你，快走，别再去开什么座谈会，也别再回学校了。”

他说话时两眼直盯着我。我知道出了什么事。军阀们的铁爪正在从宁波伸到我们这小小的县城奉化。罪名大概也是明白的：“赤化分子”。

“走到哪里去呢？”我迟疑了一会，说，“可能还只恐吓一下，吓你离开这里，别中了计吧！”

“他们要把你抓起来的风声已经传的很久了。”竹书说，“这回已经派了警察来，显然不只是恐吓的了。”

世楣站在一边，一时没答腔。他也许在考虑今天我们去公园招待城里青年开座谈会的任务，他也许在回想去年来敌人方面几次用谣言攻势迫使仲隅从县中离开，而这回是否也是重施故技。但他听到了竹书的话以后，皱一皱眉，接着说道：

“也许这回真的要下毒手了。不久以前，宁波的段承泽，这镇守司令，不是把蒋本菁抓起来了么？”他迟疑一下，“我看，你还是避一避风好。”

“避一避风？”

“走，我陪同你，就在这时，立刻，出北门走向宁波去。”竹

书义形于色地说。

“那么，我真的要放弃岗位，走上流亡的路了吗？”我苦笑着。“这真是想不到的事。”

“还有我们守着呢。”世楣说，“我们的命运，看来决定于将要到来的北伐的形势，再说赵济猛、石德濂他们和我们剡社一些骨干合起来，还是有力量应战的。走吧，暂时避一避风更妥当些。”

这样，我的“运命”就在这三人的“路边会议”中决定了。

“走，赶到宁波去。”

当时，从奉化去宁波有两条路，一条出大桥到西坞，趁小轮船。但这时已经下午二点多钟了，显然赶不上轮船。一条出大桥到南渡趁夜航船。但敌人既然要抓你，不会不在交通码头上兜捕的。

“走去就是了。”竹书看我在迟疑，催促着说，“现在是二点钟，八十里路，八点钟可以走到。走吧。”

我们匆匆地走出北门，走过了北门外的大沙堤，就一直朝东往大路上走去。竹书走在前面，我跟着。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急速地走着。

不能不使我回想起最近的和过往的一些事，仿佛这些事就决定着这次出走的命运。

要我离开奉化，离开县立初中的恐吓，已经不止这一次了。两个月前，在一个深夜里，县议会里一个姓张的议员，算来也是剡社的社员，排闼闯进校来，直入我的卧室，形色仓皇地说道：

“你必须赶紧离开这里。我从县衙门那里得到消息，沈秉丞正在设法逮捕你。他们想用法律手续，控告你公然侮辱罪，因为你在《新奉化月刊》上，写文章骂法治协会的人。之后，他们就想在打官司当口，提出你有赤化的证据，把你当作一个赤化分子逮捕起来。据说，这还因为宁波镇守司令段承泽行文到这里要逮捕赤化分子，你就这样给算上是一个了。”

他气喘喘地说上了一大堆。之后，还加上断语说：

“真的，别的罪名还没有什么，只是赤化分子的罪名那是性命交关，要杀头的呢。”

我笑笑回答道：

“杀头？那确是性命交关的。一个人只有一个头，我又不是牛魔王。可是，我还不能离开这里。”

这自然使那位姓张的议员不免失望了。他摇摇头，悻悻然回去，仿佛深怪我不接受他的好意。

自然是好意，但我也怀疑他的好意。他虽然也是剡社的社员，但我认定他是两面派，私下里是和法治协会分子有勾通的。本来嘛，这剡社的组织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团体，不是彻底的革命派。从它形成的过程和组织成员来看，大致是可以这样说的。发起组织剡社的是在宁波当小学教员和日报记者的奉化小知识分子。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气，也有流入到这闭塞的中古式的城市。一些小学教员就有茫然的追求新风气的倾向。他们回想到辛亥革命之前，奉化曾经有过一度革新运动，一些留学过日本的乡下知识分子，首先创办了龙津中学，讲求新学，聘请日本教员，一时来学的，望风而至，连宁波的一些青年也要负笈到奉化这个山城里来求学。这就引起了城里的官绅们遑遑不安，眼看这些革新派将会推翻他们的固有的势力，于是他们另办一个中学，叫凤麓中学，以资对抗。但不久以后，宁波建立了甬江中学，以后又改为省立四中和四师，这地处偏僻的奉化就办不下去中学了。于是都告停闭，成立了一个锦溪高小学校。而一些乡下士绅那时又向外发展，早在上海开了家书店，在宁波创办了日报，又在余杭创立了农林牧畜场，他们转向到实业救国的路上去了。……接受了五四新风气的一些青年就想起了这个光荣的传统，要来一次对奉化社会的改革，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出发，想用教育来改革奉化，隐约间抱

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恰巧，一九二三年浙江省实行所谓“省自治”，各县都设立起县议会来。这些青年就组织了一个剡社，来争夺这个县议会的议席，企图通过议会在奉化设立个县立初中。在争夺议席之间，城里士绅成立一个法治协会以与剡社相对抗。斗争在争夺议长席位时激烈地展开了。剡社拥戴忠义乡的老绅士庄嵩甫做议长。他正是清末创办龙津中学，在上海创办新学会社，在余杭创办林牧公司，抱着实业救国主张的维新人物。而法治协会为了维持他们在奉化的统治实权，则拥护城里巨绅戴南邨作议长。在议会成立的前夜，庄嵩甫正患着重病，法治协会趁此机会造谣说庄某已因年老病重不幸死掉了。一般从收买中得到选票的议员，纷纷倒向戴南邨一方。可是正当议会揭幕之日，庄嵩甫却矫健地到了会场，并且发表了演说，于是形势一变，过半数的议员都投向他，他终于被选为议长。剡社接着又吸收一批开明士绅做了社员，扩大了组织，并且不久以后，在县议会里通过了创办初中的决议。这样，一些剡社的骨干分子就在一九二四年春季来到了自己的故乡，聘请了竹书的父亲严老先生当了校长，在宁波一带当小学教员的胡行之、庄世楣和我的二哥王仲隅就回到故乡奉化来主持初中开办事宜，于一九二四年春季开学了。

那时候，宁波第四中学已由经子渊当了校长。一九二三年的夏季，浙江传来了经子渊来长四中的消息。曾为薛福成的幕僚、并据传曾经主张过杀秋瑾的宁波遗老张让三，首先出名致函反对。函电登载在报上，指斥经的罪名是宣传共产公妻，宣传赤化。那时，我们曾联名驳斥此项函电，并表示欢迎，这样，在宁波就发生了反经派和迎经派的笔墨之战，而经子渊却终于在一九二三年秋季来到宁波了。随着也带来了左倾的教员和新文化思想。一九二四年春，宁波的国民党分党部成立了，同时，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组织也成立了。实际策划奉化初中的胡行之，他们一方面部署力量，把我安插在离城十几里外的上田坂松林高小学校那里，另